

好一个『最漂亮的房子是学校』

从今年秋季开学起,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陕西宁陕县的所有学龄前儿童将可以免费上幼儿园,这意味着该县率先在全国贫困地区实行15年免费教育。目前的宁陕县委县政府办公楼是由上世纪90年代的单身宿舍改建而成,10年来未装修,风格简朴。『在宁陕,最漂亮的房子就是学校。』(《京华时报》9月27日)

好一个『最漂亮的房子是学校』。全国究竟有多少校舍“好过县委大楼”无据可查,也无从“考证”,但切入到现实当中,我们却非常清楚,一座城市中最漂亮的建筑物或许是豪华的大酒店、大剧院,或也许是美轮美奂的政府办公大楼,不管怎么看都跟学校不沾边儿。

前些年,曾有一座“最美希望小学”引起社会质疑。媒体当时的报道称:该小学采用欧式建筑,周围环境非常好,学校各项设施至少50年不落,被网友们称为“中国最美丽的希望小学”。小学总投资350万元,相当于捐建17个希望小学。于是就引起了舆论的争议:花350万建一所希望小学值不值?这样的质疑看上去理直气壮。但事实上,建学校不是只向学生提供几间可以遮风避雨的简陋教室,涵盖建筑、附属设施和教育相关资源完整配置的一所小学,耗资350万真的很多吗?

随后又传来成都草堂小学翠微校区和水立方等知名建筑同获第五届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奖的消息。很多人更是感觉不可思议,一所小学怎么能投入如此巨大、建设如此精美。但反过来想,学校为什么就不能这么华美?在国外发达地区,最华美的建筑很多都处于教育和公共领域,何况我们的学校建筑就不能“精美”一些?

“最漂亮的房子不是学校”固然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最漂亮的房子是学校”却很是说明问题。因为这意味着地方财政对于教育的足额投入,意味着教育享有充沛而丰润的资源,意味着教育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之相比,有些地方政府宁可花费巨资建设华丽的楼堂馆所,也不肯在教育上多投入一毛钱。在很多地方,学校设施陈旧落后“掩映”在高楼大厦林立的现代城市中几乎成为另类景观。

“再穷不能穷教育”,可教育投入不足一直是制约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软肋”,财政性教育投入长期以来没有达到法定的4%的比例。虽然2010年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2012年达到4%,但现实中不能真正平稳落地,还是一个未知数。从这个意义上说,免费教育模式无法复制,“最漂亮的房子是学校”也不必刻意追求,但保证足额的教育投入却应该不难做到吧? 陈一舟

『农民工进大学』求解『上升焦虑』

“农民工也可以上北大了。”9月25日,由共青团广东省委联合有关部门推出的“圆梦计划”完成了今年秋季招生考试。按照这个计划,政府出资,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等10多所高校联手,推出物流管理、模具设计、机电一体化等专业,为1万名在粤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以网络授课为主的大学教育。

上大学,是多少农民工遥不可及的梦想。如今,象牙塔之门开始向年轻的农民工们敞开,知识力量成为他们人生新的“变量”。这个变化,为个体发展带来新希望,也将为整个社会的发展创造新契机。

“培训很贵,不培训更贵”,这是日本企业家松下幸之助的经营之道。这样看来,对劳动者进行教育培训,实在是“一本多利”的“买卖”:可以让农民工提升能力素质,使企业获得优质人力资源,可以助力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教育特别是平民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社会学家看来,教育是使人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电梯”,教育是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社会管理者也深刻认识到,没有教育机会均等,就谈不上社会公平。

当前,我国的农民工总数已达2.42亿,新生代农民工接近1亿。仅以广东论,在粤务工的“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约2000万人。“拉着拉杆箱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扛着蛇皮袋进城”的父辈相比,放下了“乡土梦”,怀揣着“城市梦”,他们希望融入城市生活,成为“新市民”。因此,在参加过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仅占30%的现实面前,在他们面临的“回不了村、进不了城”的窘境面前,在报名网站“塞车”、报名电话打爆的需求面前,“圆梦计划”的推出,不仅为农民工个人提供了成长新平台,更是为整个农民工群体的全面发展、向上流动展现了新的可能。

其实,在社会转型期,“上升”的焦虑和需求,一直激荡于变革进程。从30多年前“潘晓来信”中“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迷惘,到3年前“罗炼出走”发出的“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的无奈;从今天徘徊于城市各个角落的“蚁族”、“北漂”,到“拼爹就业”、“萝卜招聘”引发的“阶层固化”反思,不断提醒人们,在一个流动性加剧的时代,我们的社会更加需要为奋斗者提供公平的舞台,为梦想者提供抵达的路径,实现“人人皆有可能”的包容性发展。

尽管刚刚开始,但广东的“农民工高考”已引起教育部和各地的关注,更多的“圆梦计划”正在酝酿,给社会管理者带来启示:面对流动时代的“上升焦虑”,需要在社会管理中彰显“圆梦思维”,创新管理思路,整合社会资源,开辟更多上升通道,把人们的期盼、社会的需求变为又一个扎实的“圆梦行动”。 詹勇

天价『搓板路』背后有多少失察

投资87亿多元建设的甘肃省天水至定西段高速公路,通车约半年竟出现坑槽、裂缝、沉降等重大病害,部分路段不得不铲除重铺。这条高速公路,被当地居民称为“豆腐渣工程”。

本该光滑平整、直通无碍,却大坑连小坑,满目疮痍,形如“搓板”,这条被称为物通甘肃东大门的“发展之路、希望之路”,在当地居民心中,显然已经变成了发愁之路、失望之路,实在令人痛心和悲愤。

天定高速公路项目常务副主任张志勇说,修路时所用材料,就单项而言都合格,但因为大都处于质量标准的“低限”,累积起来可能就会引起一些问题。既然单项合格,为何累积起来出问题?又为何处于质量标准的“低限”?所谓的低限,也许就是不合格的委婉表达。即便合格,但处于质量低限,既拷问施工方的职业道德,也拷问监管部门的监管水平。

张志勇称,沉降问题与地质构成有关,“一些路段基础偏软,修路时一次性完全处理好很难”。这就是咄咄怪事了,地质构成是客观存在,工程如此重大,投资如此浩大,怎能不详细调研、全力应对?如果未雨绸缪、科学施工,何须等到沉降了才抱怨地质构成?

原本在整个施工过程中,监管部门都不应缺席,应该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动态监管。如果监管有效,也不至于出现通车半年就大修怪事。还可以追问的是,对这样一个问题公路,究竟是怎么样验收通过的?豆腐渣工程的背后,豆腐渣监管约可见。

道路破损可以修,形象损失难补救。“搓板路”的背后,从施工到监理,从技术到管理,到底有多少失察、失守,还期待有关部门能彻查。 秦宁

“硬汉”李林森的取舍观让人动容

连日来,笔者像大多数人一样,也深深被万源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林森的事迹感动着。他那人做事的风格令人敬佩;他那坚持原则、忘我工作的品行令人敬佩;他那面临抉择,毅然舍小我、为大我的情怀更令人敬佩。

笔者认为,李林森令人感动和敬佩之处源于他的取舍观。面对取舍这样一个常常令人犹豫不决的难题,李林森似乎没有过多的彷徨,即使生死之际,也依然坚定地选择工作,选择为党和人民奋斗到最后的一分钟。这是我们的感动之处,也是他的可贵之处。

舍弃个人利益,选择党和人民,这是作为共产党员的一种职责,是党员干部应该具备坚定的信念。李林森做到了,他是党员干部

楷模和榜样。“把工作当命”、“追求完美”是李林森的行为写照,群众利益和组织利益至上是他做人做事的原则,即使病重之时,他担心的依然是那些没做完的工作。他为党的事业尽心尽力,坚守到了生命的最后一瞬间。无论疾病还是健康,都始终毫不动摇地坚守那份忠诚,这就是共产党人的修养。

事实上,在党的事业发展的历程中,一直不乏像李林森这样舍小我、为大我的优秀干部。孔繁森、焦裕禄、杨善洲、王彦生等,他们身处不同的岗位,但都始终如一地选择了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奋斗不息,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坚定跟党走信念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赢得了党和人民的赞扬和称颂。

对照他们的取舍观,每名党员

干部都应该扪心自问:面对利益冲突,我们能不能舍弃个人利益,选择履行入党誓言,时刻维护党和人民利益?面对群众困难,我们能不能舍弃个人安逸,选择牢记宗旨,全心全意为群众排忧解难?面对各种诱惑,我们能不能舍弃私心杂念,选择坚持原则、公道正派地做人做事?面对不同岗位,我们能不能舍弃浮躁抱怨混日子,选择埋头苦干、尽职尽责,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党的事业中?

人的一生要面临很多取舍,相信无论作出什么样的选择都有自己的道理,但是,唯有一种选择会令人敬佩,今已无怨,那就是像李林森那样选择对党和人民忠诚,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奋斗不息,燃尽生命之火。 刘伟雅



刚刚拿到新房钥匙,正准备装修新居的贵阳市民张女士,提到装修报价这事时,头痛不已。一次偶然的机会,她从朋友处得知贵阳现在有专门的家装行业“砍价师”可以帮助业主砍价,张女士于是联系上了一位“砍价师”。果不其然,在他的帮助下,还真在装修公司给出的底价上,又砍掉了2500元,按照事先约定支付了20%的劳务费后,张女士还省下了2000元。现在在贵阳,类似这样专门帮人“杀价”的职业砍价师还真不少,有些甚至成立了专业的砍价网站和团队。目前在北京、广州等地,网络团购砍价师已非常普遍,大部分的建材、家具、家电团购网站都有自己专门的职业砍价师,这些人都是在行业中摸爬滚打多年有经验的老手,对于商品的信息非常了解,所以才能胜任职业砍价师一职。 焦海洋 文/图

“三狂州长”催促官员财产公示

日前,云南纪检专案组初步查清了云南楚雄州原州长杨红卫的违纪违法事实:近5年来,杨红卫先后收受受贿1000余万元;杨红卫与妻子余赛英在昆明、个旧、弥勒等地有房产17套,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有房产6套;杨红卫被称为“三狂州长”,他吸食毒品,与26名女性有不正当两性关系。(9月26日《经济参考报》)

尽管人们的想象力是无穷的,但云南楚雄州原州长杨红卫的所作所为,还是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杨红卫腐败案,再一次证明暗箱里的权利多么可怕,昭示出官员财产公示的急迫。

其实,比起贪污上亿元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杨红卫的贪污数额并不让人吃惊。但杨红卫的贪腐却是最见不得光的,作为堂堂州长,他居然长期吸食毒品,玩弄数十名女性,坐牢国内

外23套房产!这其中任何一条,都让人咋舌。杨红卫的腌臢事,暴露出现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严重缺失。吸毒、炒房子、玩女人这样的事,都是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可杨红卫样样大行其道,多年来不露马脚,直到地震灾区的灾民反映灾后重建的民房问题,才牵出这一系列丑闻,足见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薄弱。

纵观杨红卫的“三狂”——“狂热”指的是其工作作风,“狂妄”是说他的为官之风,而“狂欢”则反映了他的生活作风。“三狂”之中,“狂欢”的危害最致命,让他一个高级干部志气所以,堕落到最腐朽的境地,为了维持这种腐朽生活,又不惜贪污受贿、铤而走险,陷入恶性循环。

要想遏制官员“狂欢”,根本之道是切断其财路,而切断其财路最好的办法则是建立完善的官员财产公示

制度,接受公众监督。倘若杨红卫的财产状况是公开的,他就算做一次毒,玩一次女人,买一套房子,都将逃不过人们的眼,他也不至于堕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出席2011年夏季达沃斯论坛时曾表示,要逐步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而“三狂州长”杨红卫的腐败案也再次表明,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迫在眉睫。因为不透明的官员财产状况,不仅容易诱发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让他们越陷越深,也增加了查处腐败的难度和成本。

面对反腐败形势的严峻挑战,以及公民的知情权需求,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已成为紧迫的公共需求,相关方面不宜再拿“条件不成熟”来延迟这一制度的推行。推行官员财产公示,也是人民民主、依法治国绕不开的一环。 王孝武

一些地方保护伪劣品



据报道,质检总局执法督查司司长严冯敏在国家质检总局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说,有的地方尤其在基层存在地方保护问题,片面追求GDP成为质量违法行为的保护伞。伪劣产品在许多地方的市场上泛滥成灾,早已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传说。究其原委,当然与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依然不很规范这一国情分不开。不过,只要稍作调查分析,便可知,这一乱象出现的深层根源由一些公仆的作为紧密相连。大量伪劣商品流向市场,推高了其产地的GDP,给当地当公仆脸上添彩,且顺便给地方金库带来一笔不菲的利税收入。冲着这一好处,有些公仆尽管在口头上也高喊打假,行动上却仅仅做做样子,更多时候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想招惹它,更不想剿灭它。 吴之如 文/图

据报道,湖南娄底新化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当地旱涝灾害频发。在今年5、6月份长江中下游五省持续的旱情中,新化县水稻和经济作物大面积受旱,4万多人和1万多头牲畜饮水困难,当地的水利设施亟须投入。然而即便是这样,新化县的水利资金近日却被扣和挪用,挪用的资金变成了“景区建设”的捐款,用于修建寺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9月26日《中国广播网》)

即便再不通情理,在寺庙与水利之间的选择上,公众也会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那就是水利设施。因为对公众而言,水利设施的好坏关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你可以一辈子不去寺庙上香拜佛,但不可能三天不喝水,这是基本的生存问题。比如,去年的西南大旱给予我们的震撼,不在于南方地区出现旱情后几乎毫无招架之力,更重要的在于水利设施的修建根本不配套,旱情来临水利设施要么陈旧破败不能使用,要么还未曾修建,对于缓解旱情起不到丝毫作用,甚至于连饮水都无法保障。

既然如此,当地政府为何没有修缮水利设施,反而克扣挪用水利资金用于修庙?很明显,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当地官员的判断标准和公众基于生存意识的判断完全不同。长久以来,上级部门考察下级政府的政绩其实着重是看当地的经济。而在一般官员看来,投入与产出是呈正相关的,投入越多产出越多,这意味着一些官员在地方经济的发展上极为强调投入的重要性,甚至不惜挪用其他民生拨款用以进行所谓的经济投资。

具体到湖南新化县。因为这个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自然除了当地可能存在的自然资源和人资源外,其他现代工商业体系整体不发达,市场经济不景气,经济发展也就陷入疲软,这对当政者而言是极为不利的。那么如果能另辟蹊径找到一条经济发展之路,就成了贫困县地方政府着重解决的问题。与此相比,那些民生投入反而成了次要支出。但这也陷入另一个窠臼之中:许多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着眼点不再是合理的规划和对本地现状的清醒认识,而是人为制造一些“景观”,用以吸引游客发展旅游,毕竟如今最符合持续发展且投入较低的还是旅游业。人为景观的制造,寺庙建设无疑是最佳选择。在中国,只要有山的地方就会建寺庙,有些确实是古刹,是遗留下来的历史人文遗迹,但大部分则是后来重新规划建设。这种地方除了那些极为虔诚的佛教信仰者,以及较为迷信的人外,很难吸引来游客观光,自然所谓的旅游业也就名存实亡。 戈海

权力在寺庙与水利之间为何选择错位

据报道,湖南娄底新化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当地旱涝灾害频发。在今年5、6月份长江中下游五省持续的旱情中,新化县水稻和经济作物大面积受旱,4万多人和1万多头牲畜饮水困难,当地的水利设施亟须投入。然而即便是这样,新化县的水利资金近日却被扣和挪用,挪用的资金变成了“景区建设”的捐款,用于修建寺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9月26日《中国广播网》)

即便再不通情理,在寺庙与水利之间的选择上,公众也会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那就是水利设施。因为对公众而言,水利设施的好坏关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你可以一辈子不去寺庙上香拜佛,但不可能三天不喝水,这是基本的生存问题。比如,去年的西南大旱给予我们的震撼,不在于南方地区出现旱情后几乎毫无招架之力,更重要的在于水利设施的修建根本不配套,旱情来临水利设施要么陈旧破败不能使用,要么还未曾修建,对于缓解旱情起不到丝毫作用,甚至于连饮水都无法保障。

既然如此,当地政府为何没有修缮水利设施,反而克扣挪用水利资金用于修庙?很明显,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当地官员的判断标准和公众基于生存意识的判断完全不同。长久以来,上级部门考察下级政府的政绩其实着重是看当地的经济。而在一般官员看来,投入与产出是呈正相关的,投入越多产出越多,这意味着一些官员在地方经济的发展上极为强调投入的重要性,甚至不惜挪用其他民生拨款用以进行所谓的经济投资。

具体到湖南新化县。因为这个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自然除了当地可能存在的自然资源和人资源外,其他现代工商业体系整体不发达,市场经济不景气,经济发展也就陷入疲软,这对当政者而言是极为不利的。那么如果能另辟蹊径找到一条经济发展之路,就成了贫困县地方政府着重解决的问题。与此相比,那些民生投入反而成了次要支出。但这也陷入另一个窠臼之中:许多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着眼点不再是合理的规划和对本地现状的清醒认识,而是人为制造一些“景观”,用以吸引游客发展旅游,毕竟如今最符合持续发展且投入较低的还是旅游业。人为景观的制造,寺庙建设无疑是最佳选择。在中国,只要有山的地方就会建寺庙,有些确实是古刹,是遗留下来的历史人文遗迹,但大部分则是后来重新规划建设。这种地方除了那些极为虔诚的佛教信仰者,以及较为迷信的人外,很难吸引来游客观光,自然所谓的旅游业也就名存实亡。 戈海

如此一来,结果只能是修建水利的财政拨款被浪费,所谓的经济投资也会打了水漂。说白了,这种挪用水利资金用来“景区建设”只会得不偿失。而从权力职能的角度来看,此种行为更是损害了公众合法权益。政府具备经济职能,但这种职能不是让政府拿钱直接参与到市场当中。政府同时必须履行保障民生的职能,不能因为经济而忽视民生,两者之间不存在谁替代谁的问题。既然已经规定是民生支出,相关部门就不能强行挪用。这种绩效正是监管不力、审计不严、处分不力的原因所致。所以,对这种行为如果不严肃处理,还会有贫困县会步人后尘。 戈海

“离婚计算器”是一个善意的婚姻提醒

近日,一款“我的离婚计算器”在网上非常红火,测试人只要参与回答网页设置的十个问题,系统自动来一番加加减减,一分钟之内就能算出看似复杂的“离婚成本”。记者和网友测试之后发现,“离婚成本”之高,让人“伤不起”!(据9月26日《扬子晚报》)

“离婚计算器”有点像之前一些公安部门推出的“打架成本”。与打架有成本一样,离婚显然也是有成本的。虽然处在感情与婚姻的角度来说,夫妻之间离不离婚,与离婚物质成本的大小并无直接关系。离婚的主要决定因素在于双方的感情是否破裂,夫妻矛盾是否不可调和等。然而,面对如今社会离婚率居高不下的事实,特别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属于冲动性离婚的现实,为离婚计算一次“离婚成本”,确实很有必要。

以南京市为例,2010年共有25590对夫妻到民政部门“分手”,平均每3对新人喜结连理的同时,就有1对夫妻分道扬镳。这些数字是让人忧心的。婚姻是夫妻之间的基础关系,是家庭稳固的核心力所在,更是社会稳定的影响力因素之一。婚姻的理性与稳定,是社会向前发展的基础保障。居高不下的离婚率,反映出时代变迁带给人们思想上的解放。但相对于婚姻自主深入人心的积极意义,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人,不把婚姻当回事的儿戏态度,闪婚闪离,冲动性离婚大量存在。如此长期下去,势必会对婚姻之间是一种责任关系,需要相互负责的婚恋观造成强烈地冲击,也势必会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

网上流行的“离婚计算器”,虽然源于舶来品,也算是顺应了当下中国的婚姻现状。通过计算离婚成本,虽然可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离婚率走高的形势,但至少可以让那些冲动性离婚的夫妻,有个权衡的标准;让那些准备进入婚姻殿堂的准夫妻,慎重对待婚姻。

“离婚计算器”,是离婚率居高不下的产物,是一个充满善意的婚姻提醒。 北方

撤销评比表彰项目 拔“毛”还需去“皮”

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负责人日前称,2006年至2009年期间,全国共清查评比达标表彰项目148405个,保留4218个项目,总撤销率为97.16%。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实行总量控制,除已批准的保留项目外,原则上不再新增项目。(据新华社电)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我国评比表彰项目,竟高达14万8千多个!而3年间有九成多评比表彰项目被撤销,也从某种角度反证了评比表彰项目确实过多过滥。许多评比表彰活动大搞形式主义,毫无含金量可言,既劳民又伤财。

撤销九成多评比表彰项目,有网友认为“成果不小”;但在在我看来,仅仅公布一些数字难称“重拳”,要想将好事做彻底,必须“亮剑”有力。

首先,哪些评比表彰项目被撤销,哪些项目被保留,都应该明明白白地公示于众。如此,方能让公众知晓孰真孰假,也能预防某些本已撤销的评比表彰项目“借尸还魂”。以往,一些评比表彰因乱收费而曝光,事后调查才知,该项目其实早已取消。民众上了当,乱评奖者被查处,却无人承担信息不公开、不透明之责。

其次,拔了滥评比的“毛”,还要去乱表彰之“皮”。俗话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因为有那么多数热衷于滥评比、乱表彰的部门(皮)存在,才会丛生如此多的评比表彰项目(毛)。既然要清理,就来个彻底干净,拔“毛”之后,还需去“皮”。不然,这批项目被清理,既得利益者出于利益驱动,仍会炮制出一批项目,改换“包装”,继续“扯皮作大旗”地敛财。

第三,加大清查精简力度,再挤一挤保留项目中的“水分”。有网友认为,这4218个保留项目,也未必都值得保留。同时,对现有评比表彰项目加以梳理,明确哪些可以收费、哪些不能收费,给能收费者制定一个统一标准,以防标准混乱、暗箱操作频繁。更重要的是,政府部门需要转变考核评价体制,这是另一张“皮”,不能再以这奖那奖定好坏、论英雄。滥评比、乱表彰已为害不浅,正如一位官员所言:一些单位抓工作松松垮垮,搞评比表彰轰轰烈烈,为取得“荣誉”上骗组织,下哄百姓,有的甚至借“评比”之名行“卡要”之实,败坏党风,误导民风。 何勇海